

知识分子图书馆

向权力说真话

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

保罗·鲍威 编

王丽亚 王逢振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向权力说真话

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

保罗·鲍威 编
王丽亚 王逢振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权力说真话: 爱德华·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 / (美) 鲍威编; 王丽亚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知识分子图书馆)

书名原文: Edward Said and the Work of Critic

ISBN 7-5004-3841-9

I. 向… II. ①鲍…②王… III. 文学评论—文学理论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660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Edward Said and the Work of the Critic: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Edited by Paul A. Bove

Copyright © 2000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k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

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 1989 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 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 1996 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 60 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

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

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斯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

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

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爱德华·赛义德：真正的知识分子 (前言)

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W. Said, 1935—) 的名字对我国的广大读者已经相当熟悉。作为当代美国重要的批评家，他的著作卓傲不群，富于独创性，善于将表现理论和文化实践联系起来。他不仅认识到欧洲大陆的哲学和跨学科研究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而且付诸实践，将它们吸收到自己的批评著作当中。在美国，他是最早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探讨法国结构主义的批评家之一。最近一些年来，他注重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及整个艺术）研究的关系，发展了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批评——后殖民批评，论述文化生产的政治活力，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98 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疆界 2》出版了一期评论赛义德的专号，2000 年作为专著由杜克大学出版，题名《爱德华·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向权力讲真话》(Edward Said and the work of critic: speaking truth to power)。文章的作者多为美国著名学者，如汤姆·米切尔、斯皮瓦克、乔纳森·阿拉克等，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一次反思。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翻译出来，列入“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

受该书的启发，我想对赛义德体现知识分子或批评家作用的三本著作略加评述。这三本著作是一个小的系列，即《东方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和《报道伊斯兰》。

《东方主义》发表于1978年，在这部著作里，赛义德集中探讨了文化权力的作用以及社会语言对意图和生产的影响。这源于他对话语调动政治权力的兴趣。赛义德认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影响并保持那些以为会获得客观认识的个人的思想。在《东方主义》里，虽然赛义德的方法包括仔细研究个人对东方主义话语贡献的决定性影响，但个人意图性的范畴却被东方主义话语大大地压缩了。意图性——至少普遍的、主导的意图性——以前一般被假定是人的生产意义的努力，但在这部作品里，它似乎成了对通过知识生产而获取权力的一种强制的、集体的兴趣。作为这种怀疑论的意图性观点的后果，赛义德在《东方主义》里所讨论的个体作家便被认为生产一种静止而顽固的话语，诱使这种话语的其他使用者陷入一种大的集体的误解。

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话语的主要论点是，尽管过去二百年来这种话语的策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从本质上说它并未得到发展，因为它关于东方的中心神话并未改变：东方文化本身是一种发展受到阻止的文化。赛义德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倒退有助于形成某种西方的身份，也有助于形成某种东方的身份，因为它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意志。赛义德从他的观点中排除了关于东方“现实”的任何争论，强调东方的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简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统治、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西方的风格或方式。”（原作第3页，以下凡引自原作处均只注页码）因此应该借用福柯的话语概念来确定东方主义，“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考察，人们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支配东方的庞大的、系统的戒律，正是通过这种

戒律，欧洲文化才得以在启蒙运动以后从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科学上以及想象上控制——甚至创造——东方。”（3）换句话说，东方主义的话语构成并制造出东方。赛义德指出，这种话语的功能就是打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通道。他论证说，大量政治统治的事实依赖于合法化的话语，这种话语决不是装饰性的，也不是无能的上层建筑的话语。相反，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领域的基本特征，它产生出一系列进行干预的戒律，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管理、甚至军事等各个方面。

赛义德有意将东方主义历史化，以此说明话语本身如何通过不同的事件发生了改变，例如哲学的发展确立了一种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套同族的组合，具有内在的种族特点，而不是一种直接的、线性的系谱。然而他确实辨析出整个历史上一些复杂的与遏制发展相关的倾向。在这些倾向当中，最重要的包含着一种优劣的对立，赛义德指出，在19世纪日益发展的文化比较主义科学的核心，很容易发现这种对立。这种评价性的对立后来在科学主张的修辞中披上了盔甲，因为文化知识日益变成了职业化的，西方帝国主义也逐渐把东方主义从文本和思考的话语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和政治的话语。赛义德在许多模式化的判断中辨识出这种基本的对立，但提出这些判断的人却各不相同，从古斯塔夫·福楼拜到汉密尔顿·吉勃，从厄尼斯特·里南到亨利·基辛格，各类人物无所不有。例如，福楼拜与一个埃及妓女的遭遇产生出一个颇有影响的东方妇女的典型：她从不谈自己，从不表现自己的感情、存在和历史；谈她和表现她的是福楼拜，福楼拜是个西方的外国人，是个男人，相对而言还是个富人，这些都是“优越”的事实，而这种优越不仅使他在肉体上占有库查克·哈内姆，而且还代替她说话，告诉他的读者为什么她是典型的东方女人。赛义德认为，这种优劣的对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它代表着东

西方力量关系的一种模式，也表明了实现这种关系所用的话语。其他关于东方主义的一致设想包括：关于一切东方事物的假定的代表性，强加给东方人的集体性身份，与东方文化相一致的稳定的共时性，以及东方人不能表达自己、必须由其他人表达的设想。

这种种族主义和明显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话语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不过，赛义德的关键论点是：这种话语并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战斗性；相反，它是那种假想的关于东方的“客观”认识的堡垒，甚至在学术上确立了所谓的东方研究。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客观”认识形成了东方主义的基础。因此，赛义德除了论证它们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破产”之外，还宣称那些学术领域也因其静止的话语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已经落后，它们相对地脱离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也脱离了世界事态的发展。虽然赛义德的作品常常受到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专家的批评，但《东方主义》却受到许多相关领域专家的欢迎，也受到许多对表现理论、新历史主义和帝国主义感兴趣的批评家的欢迎。

赛义德对如何替代东方主义显得模棱两可，至少在《东方主义》里是如此。他常常说，东方主义包含对真正东方的根本错误的理解；然而有时他又说不存在真正的、特殊的东方，所谓东方的概念纯系西方的虚构，是他所称的想象的地理的一个实例。他说，我们应该接受的教训是，人类经验在种族和宗教范畴中的组合不是最重要的知识途径；然而他又不时为比较文化的认识指出某种希望，援用无东方主义之嫌的伊斯兰研究的作者，如阿布德·马勒克、克利福德·格兹等。虽然《东方主义》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毒害性非常清楚，但对一些普遍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作出回答，如真正文化知识的前景，个体作家如何反对文化霸权等。不过，赛义德确实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还论证说，一种非统治

的、非强制性的知识方式至少应该在方法论上是自我批判的，应该对其他学科的观点开放，应该与它所表现的民族对话，而不能把他们视为一种沉默的、无能的客体。

从总体上看，《东方主义》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历史和学术的活力，政治道德的深刻基础。这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至关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将不再成为知识分子，而只能成为具有特殊兴趣和职业追求的职员或专业人员。

《东方主义》虽然已经涉及知识分子或批评家的作用的问题，但因与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令人感到还不够十分明确。不过，在随后出版的《巴勒斯坦问题》（1979）里，他就明确地把自己置于对抗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体现了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在阐述这种立场时，我主要依靠那种我认为可以合情合理地称之为巴勒斯坦的经验，这种经验对所有的意图和目的都是一种自觉的经验。”（ix）在这部著作里，赛义德的意图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向受媒体操纵的美国公众描述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因为他们对巴勒斯坦的真相一无所知；二是再现巴勒斯坦的政治抱负，因为这种抱负在西方再现时从根本上被歪曲了。他明确宣称：他写的东西直接对抗东方主义传统，因为那种传统诽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掩盖了事实真相，袒护以色列。于是他追溯了巴勒斯坦自我意识发展的漫长过程，证明早在1880年代犹太人大移民之前，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就已经确立——他们把自己视为不同于阿拉伯世界其他人的群体，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赛义德还通过论述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利用了东方主义的话语，在过去一百年来，如何接受东方主义的战略，采取权威的姿态，把巴勒斯坦再现为一个荒凉、落后的地方，命中注定由西方占有和开发。犹太复国主义

潜在的种族主义设想，基本上与东方主义一样，认为西方的理念优于东方的理念，而这种文化上自以为是的力量，掩盖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多数人的真实存在，掩盖了以色列野蛮地强占土地，掩盖了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蒙受的苦难，也掩盖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抱负。赛义德指出，自由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是一种话语种族主义，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没有留下任何反对以色列的余地，而以色列又不能以反犹太主义来取消。

针对这种不公正的背景，赛义德肯定巴勒斯坦人民的理想，尤其是他们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联合。对赛义德而言，巴勒斯坦的事业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使命。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形成的观念，至少包括三项统一巴勒斯坦意识的原则：一、巴勒斯坦人不像以色列人，他们应认识到他们的他者身份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现实，他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现实；二、巴勒斯坦问题涉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而不只是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三、为强化巴勒斯坦历史和提高它的人民的意识，恢复家园是绝对必要的工作。赛义德认为，巴勒斯坦达成一致的目标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在西方并不受人欣赏，但西方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理想是要彻底打破引进的意识形态——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还是阿拉伯的意识形态。毫不奇怪，赛义德严厉批判美国的政策，它一向以自己的短期利益代替有效的地区合作。在赛义德看来，戴维营协议是一种歪曲，它甚至没有承认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实际上，在推进以色列的意见时牺牲了阿拉伯的利益。一般说，美国媒体以东方主义的方式运作，试图使巴勒斯坦的现实消失。赛义德认为，美国政策在这一地区的失败直接产生于它无视真相的态度，它试图按照美国的偏见改变中东的问题，或者倾向于那些能够把自己当做第三世界“美国人”的领导人的意见。

在《巴勒斯坦问题》里，赛义德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